

摘要

2012 年和 2013 年全球经济前景

世界经济处于另一次大衰退的边缘

世界经济在另一次大衰退的边缘摇摆。总产出的增长在 2011 年已经大幅减慢，预计 2012 年和 2013 年增长乏力。

威胁全球经济的问题是多重且错综复杂的。最迫切的挑战在于应对持续不断的就业危机和放缓的经济增长前景，尤其在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接近 8.6%，收入增长停滞，总需求不足，经济复苏搁浅。越来越多的工人，尤其是年轻的工人，在较长的时期内没有工作，对工人技术和经验产生不利影响，中期增长的前景因此暗淡。

迅速冷却的经济既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和其他地区财政问题的原因，也是它们的后果。一些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在 2011 年继续恶化，加剧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虽然欧元区政府为希腊的债务问题采取了大胆的举措，提出了有序的解决方案，但是金融市场依然动荡，人们对于欧元区的几个大国，特别是意大利的债务违约问题依然非常担忧。为应对这些问题采取的财政紧缩措施进一步弱化了增长和就业的前景，给财政调节和修复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带来更大的挑战。美国经济同样面临持续高失业的境况，消费者和商业部门的信心动摇，加剧了金融部门的脆弱性。美国和欧盟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出现的问题很容易互相影响，导致全球经济的另一次衰退。发展中国家虽从 2009 年的全球衰退中强劲反弹，但会通过贸易与金融渠道受到冲击。

增长放缓，二次探底风险加剧

在一系列相对乐观假定的前提下，包括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仅局限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小型经济体内，并且债务问题可以通过基本有效的方式得到解决，在基准展望方案中，世界总产出的增长在 2012 年预计为 2.6%，2013 年为 3.2%。

然而，如果政策制定者，尤其是美国 and 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在解决就业问题，阻止主权债务危机和改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方面失败，将把全球经济带入另一次衰退。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的增长会在 2012 年减速到 0.5%，这意味着世界人均收入会下降。相反，如果能够在国际范围内采取比当前的政策立场更加强有力的统一行动，全球范围的就业和可持续增长的前景会更好。在这种情况下，2012 年和 2013 年全球的产出增长会被推到 4% 的水平。但是考虑到现有的政策方法和立场，如此乐观的预计与现实相差较远。

发达国家的经济困境是全球经济的主要阻碍

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困境是全球经济放缓的主要因素。大部分发达国家正遭受着全球金融危机余波的不利影响。2011 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显著放缓。2012 年，

GDP 增长会进一步走弱。即使在以上的基准假设下，在某些季度轻度衰退也是有可能的。美国在 2011 年 8 月由于政治僵局，处于债务违约的边缘。不确定的前景正在加剧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导致它们对商业部门和消费者的借贷依然疲弱无力。从 2011 年初开始，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已经大幅放慢，大量先行指标和经济调查都表明人们的信心大幅下滑，未来的经济增长会继续放缓，停滞可能会延续到 2011 年年底和 2012 年早期。日本在 2011 年上半年陷入了另一次衰退。这次衰退主要由三月的地震而引起，尽管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虽然预计震后重建会使未来两年 GDP 的增长超过潜在 GDP 的增长水平，大约增长 2%，但是下行风险依然存在。

发展中国家依然易受发达国家经济下滑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依然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 2012-2013 年与 2010 年、2011 年相比，它们的增长速度会大大降低。虽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经有所加强，但是这些经济体依然易受发达国家经济局势的影响。从 2011 年第二季度开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始显著放缓。在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中，我们依然预计中国与印度的增长保持稳健。2012-2013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放慢至 9% 以下，而印度的增长在 7.7% 与 7.9% 之间。巴西与墨西哥预计会遭受更加明显的经济放缓。低收入国家也将经历经济减速，虽然下降得比较温和。就人均收入而言，增长率已经由 2010 年的 3.8% 下降至 2011 年的 3.5%。虽然全球经济已经减速，较贫穷的国家可能会在 2012 年和 2013 年经历略高于上述数字的经济增长。联合国定义下的最不发达国家也基本上面临同样的趋势。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产出增长率。

全球就业危机

高失业率是经济复苏的主要绊脚石

持续的高失业率依然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阿基里斯之踵。在 2011 年，发达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为 8.6%，依然远高于 2007 年危机前 5.8% 的水平。在许多发达国家，失业的实际情况要比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更为严重。比如，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自危机开始以来一直在下降。越来越多在较长时间没有工作的工人停止寻找工作，他们不再被统计为失业人口。美国大约有 29% 的工人已经失业超过一年，这一比例比 2007 年上涨了 10%。如此长时间的失业对于失去工作的个人和整个经济来说具有显著、持续的恶劣影响。失业工人技能的恶化与失业的持续时间呈正比，这会导致他们的收入水平下降，即使他们在未来找到了工作。从宏观经济上看，陷于长时间失业的工人的比例越高，对于长期劳动生产率的不利影响越大。

发展中国家就业恢复非常强劲

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恢复要比发达国家强劲。比如，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失业率已经恢复到或低于危机前的水平，拉美国家的就业也有所恢复。然而，发展中国

家依然面临高比例的工人的工作待遇带来的挑战，例如被部分雇佣、薪水很低、不良的工作条件和缺乏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险。与此同时，公开的失业率依然较高，在城市地区远超过 10%，这一情况在许多非洲和西亚国家尤为严重。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失业率也有所增长。

高企的青年失业率引起全球性担忧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青年（15-24 岁）失业率在正常时期要比其他群体的失业率高，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和伴随其后的全球衰退扩大了群体间的差异。根据有限的统计数据，全球青年失业率从 2007 年的 13%（估算）增长到 2011 年第一季度的 18%。这一情况对于一些发达国家尤为严重。青年失业率在西班牙达到了令人吃惊的 40%，西亚与北非达到 25% 以上，转型经济体为 20%。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青年失业率也比其他年龄群体的失业率增长得更快。尤其是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青年失业率虽然在 2011 年上半年情况有所好转，但自 2008 年以来已经显著提高。在南亚、东亚和非洲，青年工人面临不良工作条件的概率很高。

全球有 6400 万的工作缺口需要填补

为了恢复危机前的就业水平，吸收新的劳动力，2011 年估计有 6400 万的就业缺口。根据我们的基准模型对于经济放缓和全球劳动力增长的预计，这个差额会进一步扩大，工作的短缺会达到 7100 万，其中有 1700 万来源于发达国家。如果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像基准模型预测的那样疲弱无力，就业率直到 2015 年或更远才会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通货膨胀展望

2011 年期间，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都有所加剧。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不良的供给冲击推高了食品和石油价格，一些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收入的提高需求强劲上升。主要发达国家的膨胀性货币政策也加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通货膨胀不应成为发达国家主要的政策着眼点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和欧盟的通货膨胀率在 2011 年期间逐渐上升，从央行制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区间下限上升到了上限。这一上涨与这些经济体的政策目标相一致，即中央银行通过采取各种非传统的政策手段向经济中注入大量流动性，以减轻金融危机导致的通货紧缩风险。然而，通货膨胀不应该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主要的政策着眼点。2012-2013 年，总需求减弱，面临持续的高失业率，工资上涨的压力减轻，如果没有大的供给冲击，国际商品价格趋向平缓，所以通货膨胀预计会比较温和。

...但是，通货膨胀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担忧的问题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大大超过了政策目标。作为回应，这些经济体的货币当局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包括紧缩货币政策、提高对食品和油的补贴、激励国内生产。由于预计全球商品价格会趋向温和，全球增长放缓，我们展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也会在 2012-2013 年趋向缓和。

国际贸易与商品价格

国际贸易的恢复在减速

国际贸易的恢复在 2011 年减速，商品贸易的增长从 2010 年的 12.6% 下降到 2011 年的 6.6%。在我们的基准展望中，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将更慢，2012 年预计为 4.4%，2013 年为 5.7%。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增长的疲弱无力，是贸易增长减速的主要因素。

发展中国家对于危机的适应能力更强，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继续增长。1995 至 2010 年间，它们在世界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从 28.5% 上升到 41.2%。在 2011 年，它们在外部需求的恢复中起了主要作用，与危机前三年对世界出口增长的平均贡献为 43% 相比，在 2011 年的贡献是 50%。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归因于主要发展中国家迅速增长的工业。1995 至 2011 年间，南-南贸易的年增长率为 13.7%，远高于 8.7% 的世界平均水平。

大宗商品价格有所提高，但是它们的波动性很大

许多大宗商品价格自 2010 年 6 月开始到 2011 年延续了上涨的趋势。在 2011 年上半年达到高峰后，价格微弱下降。然而，石油、金属、农业原材料和热带饮料在 2011 年的平均价格超过了 2008 年创纪录的平均价格。在展望中，在过去两年获益于贸易条件改善的大宗商品出口国面临价格下降的压力，并且这种压力会被二次探底时出现的金融投机显著放大。2011 年，虽然金融投机被包括 G20 峰会在内的许多国际论坛提上议程，但在国际层面上，更有效监管商品期货市场的决议还没有出台。

服务贸易反映了商品贸易的发展

在 2010 年，所有地区和所有组别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又以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为代表，服务贸易重回正增长。由于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相比，对金融危机的敏感性更弱，在 2010 年与 2011 年的反弹也没有商品贸易那么显著。发展中国家仍是服务的净进口者，但它们作为服务出口者角色的表现越来越显著，尤其是在运输与旅游部门。

贸易政策的前景并不确定

在多哈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停滞的背景下，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协定（有时是不平等的）正在激增，在 WTO 磋商中采用的“变通”方法正在获得其成员国的支持。这些发展趋势将四十年代末多边贸易体制开始运行以来的基石，即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置于危险境地。

国际融资促发展

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正在影响发展所需要的融资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正在影响发展所需融资的可得性。全球复苏步伐参差不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欧洲银行间市场越来越严重的流动性紧缩，提高了人们对风险的规避程度，导致了私人资本流动出现越来越大的波动性。与此同时，官方发展援助（ODA）以及其他形式的官方资本流动也受到更加严重的财政紧缩和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与私人资本流动相同，援助这种形式的资本流动也是顺周期和不稳定的。

管理由资本流动引发的宏观经济波动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挑战。超过一个经济体吸收能力的一波波的资本流入在本质上是高度投机的，它们会导致汇率超调、通货膨胀、过度信贷和资产价格泡沫。更重要的是，不稳定的资本流动给金融和经济稳定带来了风险，国际资本为规避风险而突然停止流入甚至撤出的威胁对金融危机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一种自我保险的机制，许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对这些兴衰周期的反应是建立国际储备。在 2011 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将自己的国际储备增加了 1.1 万亿美元，储备总额达到 7 万亿美元。这些储备大多数以美国国债或其他低收益主权债券的形式投资，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全球失衡。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起到了将金融资源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作用。在 2011 年，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预计会向发达国家净转移 8266 亿美元的金融资源。进一步地看，建立储备的机会成本在于放弃了将这些资金用于为发展而进行的投资上。

金融改革并不足以抑制系统性风险

国际社会已经采取措施，通过引入新的金融监管，包括国际认可的巴塞尔 III 框架，来强化国际金融体系与减弱全球风险。美国在国家层面上采取的措施包括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然而，对系统性重要机构管制的讨论仍在继续。由于这些措施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被逐步引入，它们对当前经济与金融形势的影响还没有显现。其中许多举措是否足以抑制风险仍然没有确定的答案。

援助性资金少于承诺

关于援助和国际流动性支持是否充足和如何组成等重要问题依然不明朗。全球官方援助的交付要少于 G8 集团 2005 年格伦伊格尔斯峰会所承诺的 2010 年的

支付水平。从积极的一面看，补助金或者优惠性贷款的补助金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所增长，特别是对于直接面向最不发达经济体的援助。

不确定性和风险

发达国家经受着四个互相加强的不利因素

决策者，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未能解决就业危机和防止主权债务危机，加剧了金融部门的脆弱性，成为全球经济在 2012-2013 年前景中的最大风险；全球经济再次衰退的可能性已明显存在。

发达国家在四个互相加强的不利因素推动下处在一个螺旋式下降的边缘：主权债务危机、脆弱的银行业、与高失业率相关的需求疲软、政治僵局和体制缺陷造成政策瘫痪。这些不利因素已经存在，任何一个进一步恶化都将可能引发一个恶性循环，导致严重的金融风暴和经济低迷。并将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严重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可能引发全球信贷紧缩

最近在欧洲计划的新措施，很可能不足以解决该地区的主权债务危机，从而导致一些国家的混乱和债务违约，将为该地区及以外地区带来严重的经济破坏。2011 年 11 月期间，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努力未能平息金融市场的不安；最新的警示标志是意大利的借贷成本上升至该国加入欧元区后的最高点。大量的欧元区银行已准备遭受重大损失。主权债务危机蔓延到大型经济体，无疑会触发一个类似 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倒闭后全球信贷紧缩的情景。这样的金融危机无疑会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市场的崩溃，不仅在有主权债务危机的经济体，而是在所有其他欧元区主要经济体。经济衰退的强度，可能与 2008 年底到 2009 年初的衰退类似。

更剧烈的财政紧缩政策将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美国针对预算的政治角力也可能恶化，如果它导致剧烈并且立即生效的财政紧缩政策，势必会损害经济增长。这会推高失业率，进一步抑制家庭和企业已经非常摇摇欲坠的信心，并使已处于困境的住房部门更加恶化，导致更多的止赎，这反过来将再次把美国银行业置于危险之中。结果是美国经济可能陷入另一次衰退。美国美联储（Fed）可能会作出反应，采取更强劲的货币措施，例如新一轮量化宽松。但在高度规避风险型的低迷经济背景下，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比前几年所采取的类似措施会小很多。

发展中国家可能将遭受重大打击

只发生在欧洲或美国的经济衰退可能不足以引起全球经济衰退，但两个经济体同时衰退，则极有可能如此。在联合国预测的悲观方案中，2012 年欧盟经济

将下降 0.8%，美国则下降 1.5%。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可能会遭受一个重大打击。由于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及金融联系程度不同，不同国家遭受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主要是由于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出口下降而受损，而在非洲，拉丁美洲和西亚，以及主要转型经济体将因初级商品价格下降而受损。此外，所有新兴经济体将不得不对大的金融冲击，包括蔓延性的股票市场抛售，所持有的欧洲和美国主权债券价值下降导致的资本流出，会影响到官方储备和私营部门的资产。

全球经济失衡仍然是一个政策的关注点

全球经济在过去十年累积的庞大而持久的外部失衡仍然是决策者的关注点。减少这些失衡已成为 2011 年二十国集团在“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框架以及有关相互评估过程 (MAP) 中部长协商的主要焦点。

外部失衡在大萧条期间大幅缩小，2010-2011 年期间主要经济体的失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稳定在其危机前高峰期的一半左右。美国仍然是最大的赤字国家，虽然其赤字水平已从 2006 年的最高峰大幅下降。对应美国的赤字，中国、德国、日本和燃料出口国的外部盈余收窄，只是程度不同。虽然德国的盈余在 2011 年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左右，但是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的经常账户几乎处于平衡状态。西亚一些石油出口国仍然保有大量盈余，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0% 以上。

当前的全球再平衡是以牺牲增长来换取的

一个问题是主要经济体已发生的失衡调整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在美国，对国内储蓄-投资缺口的一些相应调整似乎是结构性的，例如，家庭储蓄率的增加可能是持久的，但是企业投资率的下降和金融危机后的政府赤字激增更有可能是周期性的。在顺差国方面，中国对外盈余的下降也可能部分由结构性转变驱动。中国的汇率政策变得更加灵活，人民币逐渐升值，在过去一年中对美元稳步升值。同时，政府扩大措施以刺激家庭消费，将中国减少外部盈余的目标更多地依赖增加国内需求达到经济结构的平衡。然而，再平衡的过程只能在中长期逐步进行以防止破坏作用。在日本，日元的持续升值已遏制其外部盈余。在德国，仍有政策空间以刺激更多的国内需求，从而进一步缩小其外部盈余。

不可持续的严重失衡固然必须加以解决，但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水平不应成为一个首要关注的问题。但是，全球再平衡议程不应该以损害发展的增长为代价，而是要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G20 戛纳首脑会议承诺政策会逐渐向这一方向移动，但大部分在短期内缩小的失衡将来自周期性的因素，包括总需求的较慢增长与缓和商品价格。因此，在基线预测中，未来两年全球经济失衡不会显著扩大。如果进入另一次全球性经济衰退，失衡将可能以通货紧缩的方式进一步缩小。

失衡是全球汇率稳定的一个风险

赤字国家继续累积庞大的对外净负债是汇率不稳这一主题的一部分。伴同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美国不断累积的对外负债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自 2002 年以来下调的主要因素，虽然伴随着波动的趋势。美国负债状况的可持续性很容易随全球市场上股票价格的变化和财政政策的可信性而转移，因此对美元的信心很容易波动。

考虑到其它地区的事件和政策公信力，美元并没有必然贬值的倾向。在欧元区，缺乏政策的方向以及处理主权债务问题的连贯性对欧元产生了下行压力。虽然略有不同但基本上类似，英国央行一直未能实现其通胀目标而遭受信誉危机。相反，日本的地震，引发了私人资本回流以进行重建工程的投资，产生日元升值的压力。全球资本流动的波动引起货币市场的进一步动荡。

货币升值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欧洲国家带来了因竞争力降低而减少出口的挑战。虽然许多新兴经济体因为收入提高而使国内需求成为了成长更显著的驱动力量，但是因为货币显著而持久的升值而被迫过早脱离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的失业人数可能激增。虽然本国货币走强有助于在进口方面降低通货膨胀，但这种优势极可能被失业率升高的社会成本所抵消。

政策挑战

发达国家面临强烈的政策困境

克服上面所述的风险并重启全球经济平衡和可持续的复苏是一项巨大的政策挑战。美国和欧洲面临彼此相互强化困难的风险。最近的经济停滞可能使选民和决策者不愿意作艰难的抉择，政治瘫痪反过来可能通过形成新的金融风暴而使经济更为恶化。在短期内，所谓的零增长或低增长的困境会由于拒绝采取必要紧急措施的方式出现，例如，一些被认为财政上谨慎的欧洲国家反对救助被看作财政上肆意挥霍的国家，这可能会迫使后者启动更多的财政紧缩政策，并诱发低增长和社会反抗。从长远来看，这种困境会存在于拒绝为达到国家金融稳定而采取的提高税收和减少福利开支的政策。

发展中国家发现自己处在不同的困境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困境。一方面，他们需要防止商品价格和外部融资条件波动造成的伤害；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采取更加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加强投资，以维持较高的增长和调整本国经济结构来实现更快的减贫和更加可持续的生产。

目前 20 国集团的政策意图，只能勉强应对

在戛纳行动计划中，20 国集团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些问题，并宣布了一个全球经济增长和就业战略。该计划着眼于解决短期的不稳定性，同时也要加强经济增长的中期基础。然而，从本质上讲，戛纳行动计划短期内并没有比各国政府在 2011 年已经启动的政策有更多的承诺，当时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已包含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紧缩政策。基线预测显示，戛纳行动计划将不足以重振世界经济或降低失业率。最后的希望似乎在于加强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基础，但就此而言，戛纳行动计划可能已经不很实用；下行风险的加剧，抵消了行动建议的有效性。

为了使复苏更强大、更平衡和更可持续，更广泛和更好的政策协调是必要的；尤其是在短期刺激、主权债务的决议和创造就业机会这些方面。中期计划的重点应在促进可持续增长和发展，加快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

当前需要更多短期财政刺激措施而不是更少

首先，发达国家在复苏依然脆弱、失业率依然高攀时，不要过早地启用财政紧缩政策。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继续高企，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债务增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甚至超过 100% 的情况下，许多发达国家政府仍然有足够的财政空间留给额外的刺激措施。在高失业率和疲弱的私人需求之下，过早的财政紧缩可能会破坏脆弱的复苏，并导致进一步恶化而非改善财政收支。与目前的政治压力相反，那些能够通过资本市场低成本融资的经济体，政府应运行自动稳定功能，并在短期内维持或加强赤字财政的刺激方案。

金融安全网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以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进一步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欧洲的临时资金设施（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欧洲财政稳定机制（EFSM））的设立，以及更永久的欧洲稳定机制（ESM）和相关措施已提供了一些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方法。然而 2011 年下半年债务危机的持续和传播蔓延到更大的欧洲经济体表明这些措施仍然不够。金融安全网的火力有限，难以应付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主权债务问题。如何显著增强 ESM 的火力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是难以实现的。债务重组机制的建立不应只限于欧洲的主权债务。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可能面临第二轮的抵押贷款危机，因为很多抵押贷款已是“资不抵债”。问题可能会因持续的高失业率和住房市场的普遍疲软而再加重。

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短期政策的关注点，将放在防止食物与商品价格上涨和波动以及汇率不稳定上，这些因素会破坏增长，从而导致进入另一个繁荣 - 萧条循环周期。这些国家将需要确保宏观经济政策是透明的反周期框架中的一部分，包括财政稳定基金的使用、加强宏观审慎金融和资本账户监管，以减轻对商品价格波动和资本流入的影响。

财政刺激须要充分的国际协调

第二个（及相关的）挑战是确保那些有足够财政空间国家出台的短期经济刺激是经过国际协调并考虑到良性的全球平衡。在欧洲，与其现行由债务国家通过痛苦的衰退性通货紧缩来调整，不如在欧元区推动通货再膨胀，同时在债务国推行紧缩与结构调整。美国将同样需要考虑这样一个渐进的步骤。应优先刺激需求以减少失业，特别是加大公共投资和直接创造就业机会。这将有助于家庭去杠杆，通过增加收入促进消费需求。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结构性措施，可以在中期加强出口竞争力，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去将经济结构调整至更加依靠国内需求。

良性全球平衡与就业复苏是可行的。使用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的模拟分析以下短期刺激措施，包括协调一致的短期刺激计划、有序的主权债务重组，为创造就业机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结构性政策，其结果显示这将对所有的经济体来说都是双赢的，因为与基准相比，可以显著促进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就业增长，同时减少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而只需做有限的汇率调整。在 2012-2015 年间，全球产量的增长将超过每年 4%，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将脱离缓慢的成长。与缺乏政策协调的基准情况相比，发展中国家也将达到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最重要的是就业率，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将恢复到接近危机前的水平，也大致消除了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留下的六千四百万个就业岗位赤字。

重新设计有助于就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

第三个挑战将是重新设计财政和经济政策，以加强其对就业的影响，并促进政策从纯粹的需求刺激过渡到以促进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化。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集中在收入支持措施，超过一半的刺激是由减税方式提供的。相比之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中国和韩国，基础设施投资往往占刺激较大份额，从而改善了供给面的条件。对各个国家而言，直接支持需求与强化供给面条件的最佳组合可能各不相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直接支出往往会产生更强的就业效应。

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商品价格和汇率的波动

第四个挑战是找到财政和货币刺激之间更大的协同作用，同时避免由于汇率和短期资本流动不稳定导致国际外溢效应的损害。这将需要在以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为目标的一个更广泛的目标框架内就量化宽松政策的规模、速度和时机达成协议。将需要加强双边和多边监督，包括对溢出效应和系统性风险进行全面的评估。此外，这种合作的政策解决方案应包括更深层次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包括那些为解决传统银行系统以外风险的改革。这将需要更深层次地改革全球储备体系，减少对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依赖，也包括建立更好的国际储备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经强调需要更强大的国际协调金融安全网。这可以通过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源和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区域金融合作机制之间更密切的合作（不仅仅在欧洲，也可以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通过加强使用特别提款权（SDR）作为国际流动性。

需要更多的发展筹资，以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五个挑战是要确保有足够的资源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只有有限的财政空间而又面临大量发展的需要。它们，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需要这些资源，以加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增长。除了提供现有已承诺的援助，捐助国应考虑新的机制，使援助流动与经济循环脱钩；以防止在危机时刻，当最需要发展援助的时候发生交付短缺。

全球经济展望弱化并且高度不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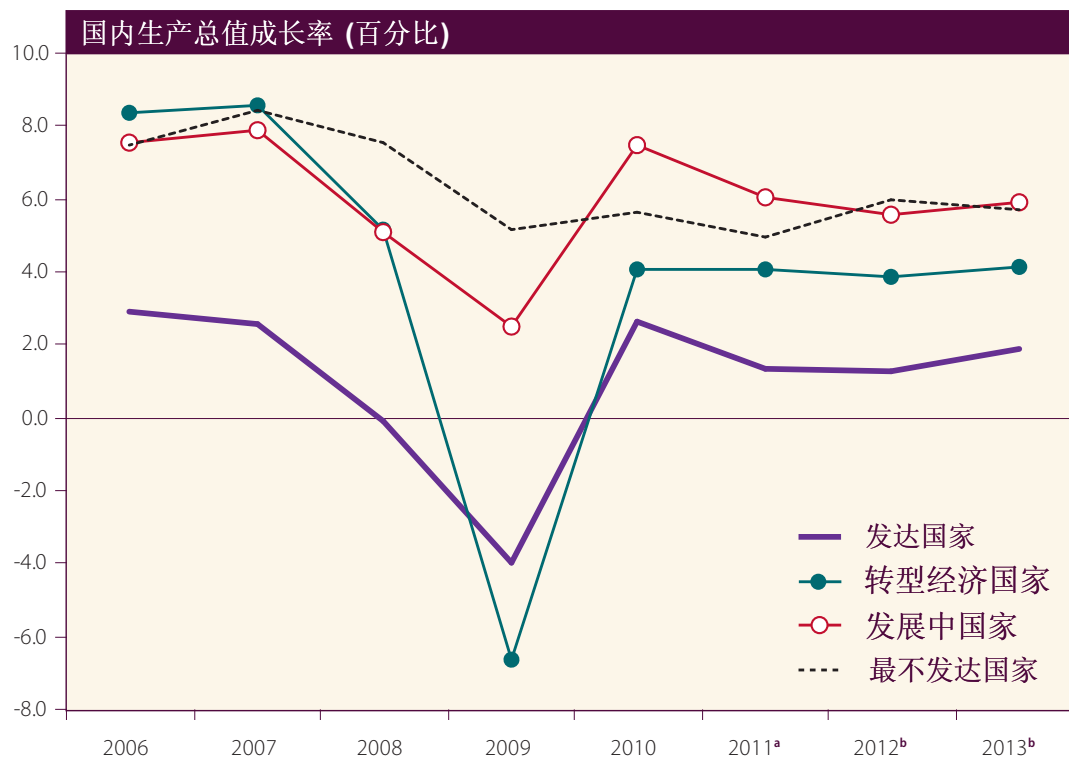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与国际经济模型连结项目

注解：基准方案的假定请参见框I. 1，悲观方案的假定请参见“风险与不确定型”的段落。

a 估计值

b 联合国预测

发展中国家继续带动全球经济的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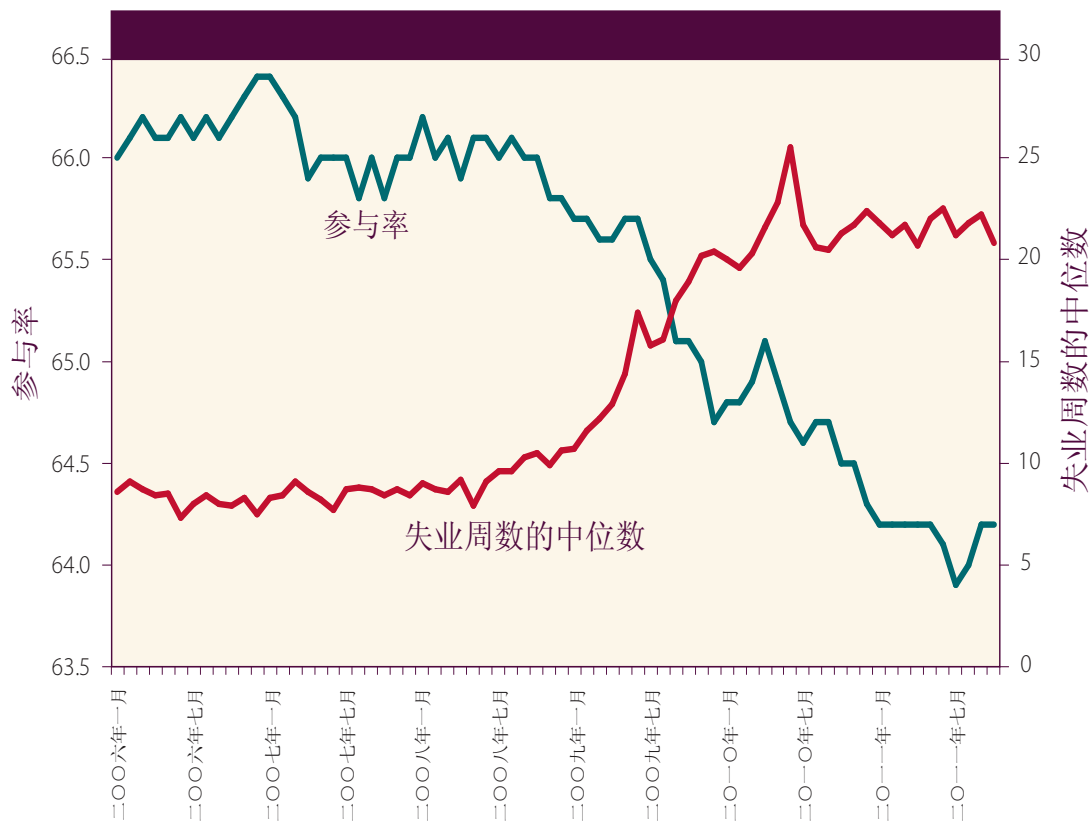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与国际经济模型连结项目

a 估计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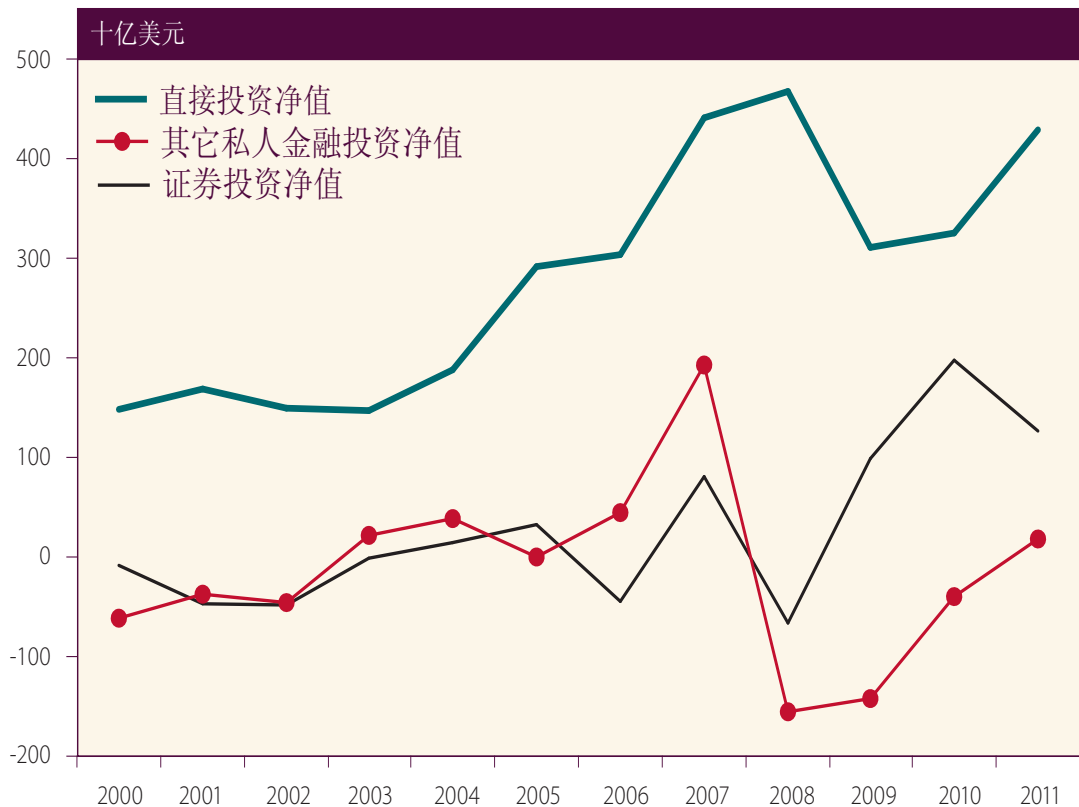
b 联合国预测

美国：长期失业 降低工作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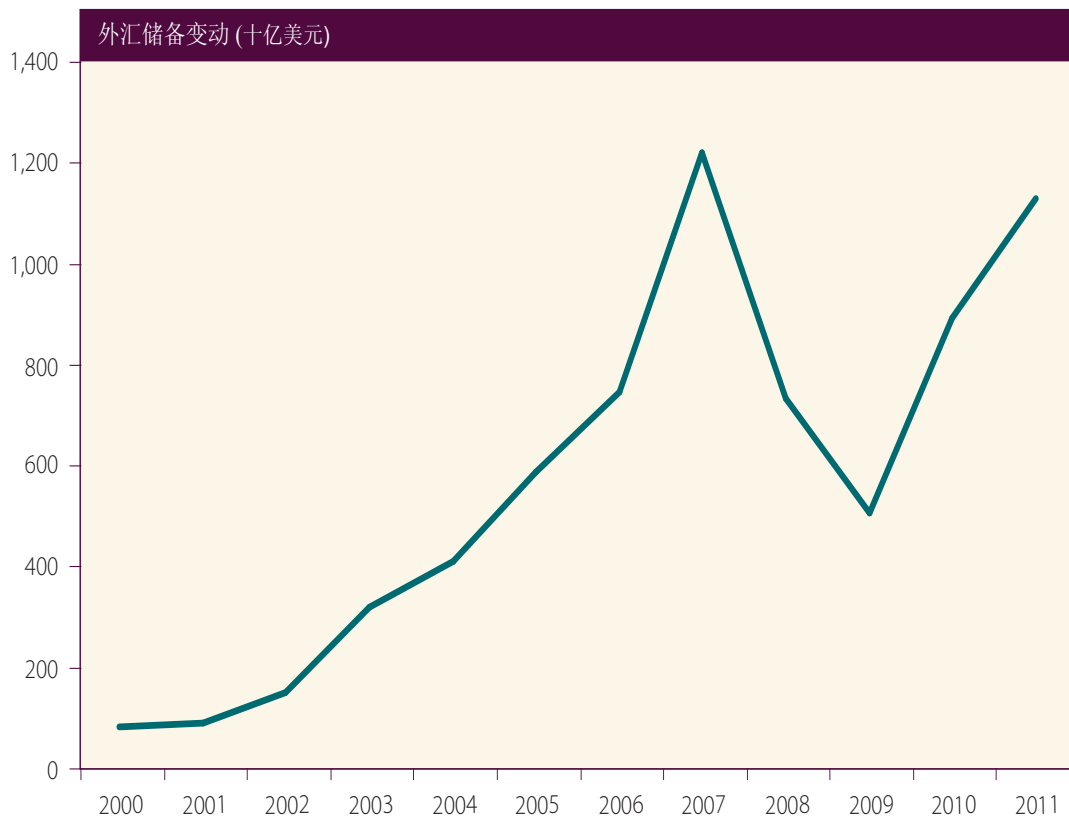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

私人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投资：经济大衰退中不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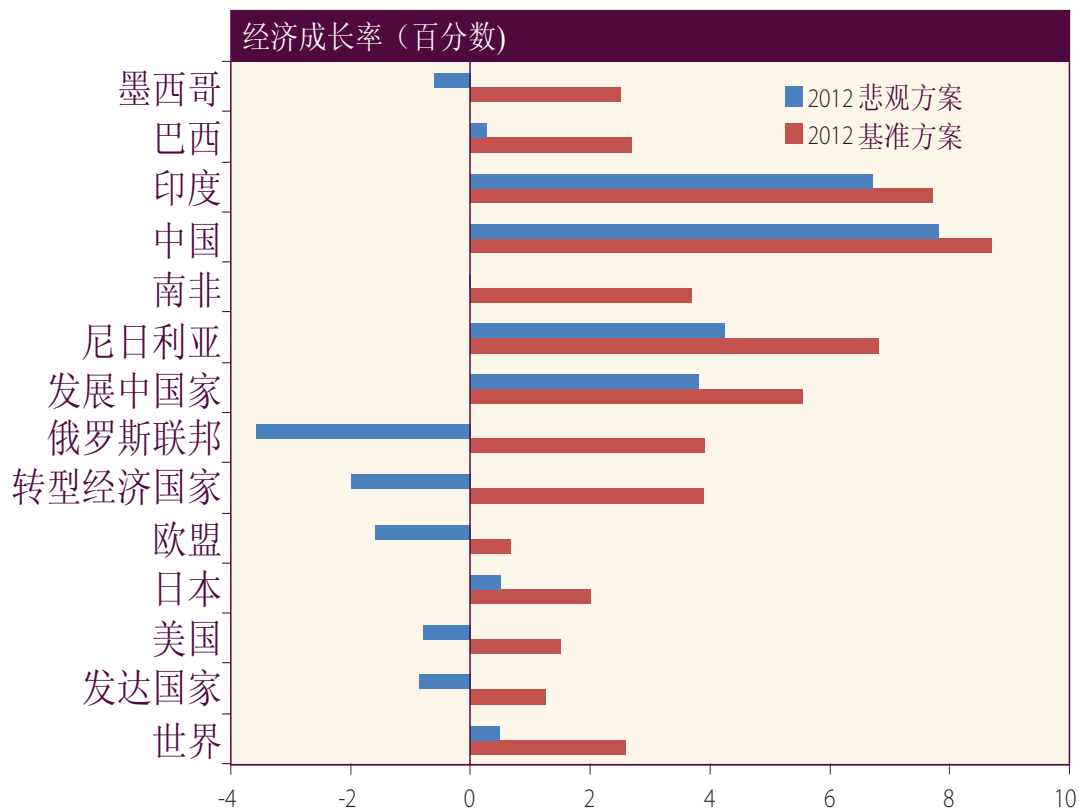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2011年九月)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继续增持外汇储备以求自保



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2011年九月)

下行风险: 发达国家衰退隐约可见



来源: 联合国/经社部 (本报告表 I.1 与 I.2.)